

“恐怖事件” 美国众议院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3月16日讨论并通过了敦促中共停止强行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美国法院新闻服务网（Courthouse News Service）3月16日发表了题为“众议院委员会谴责活摘法轮功器官（Falun Gong Organ Harvesting Decried in House Committee）”的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导。

报导中写道，纽约国会议员称活摘器官是“恐怖的事件”。并指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黑市上出售其器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此于3月16日举行了一场沉重的听证会。

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指控中共在90年代后期，即开始销售法轮功信仰者的器官。十年前加拿大政治家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进行调查后，这些指控获得大量媒体关注。

乔高及麦塔斯在2006至2007年间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写道，“2000年到2005年的六年间，有4.15万件器官移植的来源无法解释”，并且发现中共政府继续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官员声称调查报告“来自传言和不实指控”“毫无根据、有偏见”，但两年后联合国的酷刑调查官员要求（中共提供）对“器官移植来源”的全面解释。

3月1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包含六个部分的决议案，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

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Eliot Engel）首先

发言，对（中共）“现代医学的变态奇迹”进行评论。恩格尔是纽约布朗克斯区和威斯特彻斯特郡国会议员。

他说：“（移植）手术旨在挽救生命，但非自愿的活摘器官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除了这些可怕的暴行，我们还听到针对对信仰者的迫害，中国监狱从售卖器官获利的事件。”

共和党众议员罗斯-莱赫蒂宁（Ileana Ros-Lehtinen）提出了决议草案，批评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共行为加以“粉饰”。美国人权年度报告中说起器官活摘的指控，援引了中共官员黄洁夫的说法，“死刑犯器官在2012年占移植的64%，在2013年中期占移植的54%。”黄洁夫说所有的器官从2015年开始来自中国公民自愿捐赠。

罗斯-莱赫蒂宁对国务院的立场表示异议，并且认为黄洁夫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且可疑”。她说：“如果我们的国务院继续粉饰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就是将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置于危害中，因为这不是通过忽视就能解决的问题。”◎

剖析党文化 党文化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在中国大陆，政治课是一门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的必修课，内容当然是中共自己号称的“先进文化”与标榜的四海皆准之“普遍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国领袖到了中国，中共从来不敢请老外们到政治课堂上去看见识它所谓的“先进文化”，倒是美国总统们都要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做一番推崇西方文化的演讲。中共的领导们到了外国，也从没有见到他们有胆子去西方的殿堂上向莘莘学子们鼓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共产党的“先进文化”怎么就这么见不得人呢？

共产党的所谓“先进文化”其实就是党文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

党文化的基本要素

中共党文化的基本要素就两条：无神论和阶级斗争。

无神论者自古中外皆有，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在19世纪的后半期在西方出现的。无神论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的事情，始作俑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无神论走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那是列宁、斯大林之后。国家无神论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而暴力压制其它宗教信仰。中共在1949年窃取了政权，把这种残酷暴力的政教合一推向极端，无神论成为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必须学习、接受和崇拜的国教。

这几年中共在宣传无神论时，为了寻找点理论根据，甚至把孔子的话断章取义拿出来几句证明孔子是“无神论”者，把孔子标榜成无神论的祖师爷。其实，孔子有着超然的天命观，“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在《论语》中，“天”出现了32次，“命”出现了18次。孔子那么重视礼，那么重视祭祀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事鬼神”，还有“孝鬼神”，不信神还敬神干嘛呢？“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有着“神道设教”思想主张的孔子，虽然不是一个神学家或宗教家，他教人求知的确侧重人事和常识方面，不过这不能说明他不信神。

中国历史上王权与神权分离，没有出现典型的政教合一（中共统治除外），也被一些御用文人拿来为无神论背书。挺可笑。这种政教分离正是信神的儒家制定出来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建立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论证皇帝为何必须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这就是政教分离之所在。可是，董仲舒可是有神论者，他把“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他发展出来的“天人感应论”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灌输无神论，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了阶级斗争。没有了来自神性的约束，共产党的斗争才能随心所欲，斗争的花样和残酷才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出来的。

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从起家就是不光彩的。被马克思吹捧为是对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的巴黎公社，就是一群流氓无产者的

暴乱。当时美国驻法大使伊莱休·沃基伯恩在日记中写道，公社社员是一帮“强盗、杀手和暴徒”，“我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出我的憎恶……（他们）威胁要毁灭巴黎，把所有人在投降之前烧死在废墟中”。“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社员们放火烧掉了包括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卢森堡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和很多其它地方，大火燃烧了两天，还有人去烧巴黎圣母院，不过被扑灭了。就是这样的暴乱，被马克思说成“无产阶级终于发现了获得解放的形式”。列宁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样板。

中共一系列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杀人运动，给共产党的暴力斗争做了实实在在的注脚。从苏区的杀AB团，到延安整风、土改，到49年以后的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中共的斗争史就是一部杀人史。中共信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样规模的杀人政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

中共的无神论与阶级斗争一文一武，相互利用放大。因为宣传无神论，不信神佛和因果报应，所以斗争起来才崇尚暴力，无法无天，让人们长期生活在暴力、打杀、高压、恐惧和血腥的氛围中。因为无法无天，依靠暴力强行灌输，长期洗脑，才会让无神论能够深入人心。如此循环，形成了一种变态的无神斗争文化，这种文化再通过教育的形式，利用教科书、媒体、影视等各种宣传品，无远弗届地扩散到每个人的血液里、基因里，造就出来了在中国大陆特有的党文化。

党文化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在弘扬正宗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的网站上（www.shenyun.com）有关于“传统文化”高度浓缩精辟的介绍，我们不妨转录于此：

自古中国被称为“天朝”，不仅是因为其发达的文化与强盛的国力，成为周边国家的“宗主国”，更深的意思是指这里曾是神生活和眷顾的土地，是神通过不同朝代的形式传给人类丰富文化的土地。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和详实的历史记载。

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是神传文化（修炼文化）。被尊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是五千年前的一位道家修炼人。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教化百姓过着顺应天道的的生活。道家文化作为中国的文化源头流传二千五百年后，有老子出世，著《道德经》，重整了道家思想；有孔子（前551-前479）开创了儒家学说。又经五百年后（公元67年），来自印度的佛法东传至中国洛阳，经魏、晋、南北朝而蓬勃发展。至唐代（公元618-907），儒、释、道三教臻于鼎盛，也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文化自儒、释、道学说发源、发展，形成了天人合一、

敬天知命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价值观，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淋漓尽致地演义。

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也是修炼文化。对佛、道、神的信仰和对圣人的尊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和源泉，返本归真、尊道重德、天人合一、敬天知命、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

任何一个政权或政治制度都有一个文化理念的支撑，比如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和“仁政治国”的儒家理念形成了中国传统皇权的文化支撑；“人人生而平等”和“天赋人权”的理念支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由于中共以“无神论”及由此演变出来的“生存竞争”和“阶级斗争”为意识形态，因此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截然对立；在另一方面，中共政权也并非选举而来，民主国家的文化同样不适用中共。于是中共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造出了一个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也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党文化，许多人称之为“党文化”。

党文化竭力破除中国人对神的信仰，转而信奉与天、地、人斗的斗争哲学。中共党文化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1948年12月，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大校长胡适飞来南京。但是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就这样，胡适到了台湾，而胡思杜被分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父子天各一方。胡思杜主动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财物，并按照党的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在组织启发下，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后来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说，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胡思杜表示要与父亲胡适划清界线。

接踵而来的便是中共以此为契机，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几乎所有胡适的旧友、弟子也都参加了这种不得不参加、不得不以此摆脱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先生，拜读了胡思杜的文章，“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父子都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这个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

因为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热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劫难逃的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了，于1957年

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猝死台湾，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胡思杜在大陆早已“畏罪上吊自杀”了。这是一出怎样的人间悲剧，人伦悲剧。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父子反目，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这些最违背中国传统的的人伦道德，常被骂着“不肖子孙”的行为，却成为了中共宣传中的“先进典型”。著名学者胡适与他儿子胡思杜之间这一段让人心酸的悲剧，看上去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是，却是中共扼杀千千万万人性的缩写。

多少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高压、恐怖、羞辱的氛围中，在饭碗被中共捏着的时候，屈服了。当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气节，文人的风骨，在中共铁拳下倒塌崩溃的过程，也正是党文化形成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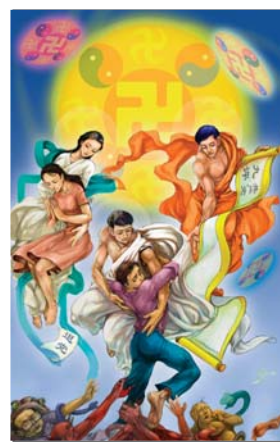
事实上，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破坏的过程。通过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通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整肃知识分子。这两次运动，屠杀了中国的文化精英。而“文化大革命”更是赤裸裸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浩劫，直接从器物层面毁灭中国的文物、古迹、字画、古玩、典籍等，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节庆、礼仪、娱乐、衣食住行等，同时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敬畏也被瓦解。

“文化大革命”除了建立起一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建立一套毛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这是五千年以来，对中国文化最全面和系统的一次破坏。《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的第六章《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有着详尽的描述。

同时中共以极为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过滤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保障“党文化”的生存。在艺术层面，“党文化”用各种艺术形式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混淆人们的是非标准，粉饰中共的罪恶，扭曲人们的思维方式，最终的目的是维护中共政权。

在党文化中恢复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

前两年，有个记者采访一名一年级新生长大以后的理想，小学生非常认真地回答：“长大后想做官。”当记者问她“想做什么官”时，这位小学生想了一下，毫不犹豫地满脸稚气地说：“长大后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好多东西。”



九評共產黨 引发三退大潮

到2015年3月31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232,022,196